

贯彻二十大精神
铸就文艺新辉煌

以中国故事推动 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王 伟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并明确强调,“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重要遵循和行动指南。讲好中国故事既是增进文明交流互鉴的客观需要,又是持续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与国际话语权的必然要求。在讲好中国故事过程中,文学艺术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讲好中国故事,关键在于如何“讲好”、在于“讲好”的途径和方法。

坚定文化自信自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中国的和平崛起在国际社会引发了愈来愈多的关注,世界渴望更好地了解中国,解码中国经验与中国模式,了解两大奇迹下中国人民的生活变迁与心灵世界,知晓中国的思想文化、风俗习惯与民族特性等。讲好中国故事,可以满足国际社会的这些需求,推进中国文明与世界其他国家文明之间的交流互融、互学互鉴,让世界文明的花园变得更加姹紫嫣红、生机盎然。讲好中国故事,关系到中国形象的对外展示、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问题。因此,文艺工作者要有高度的文化自信自强,着力抒写多彩的中国、进步的中国、团结的中国,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人无魂不立,国无魂不兴。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没有文化自信自强,就不可能创作出有骨气、有个性、有神采的作品。没有文化自信自强,就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平等交流。习近平总书记谆谆告诫,作家绝不能“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

坚定文化自信自强,需要深刻理解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保持对中华文化价值及其生命力的高度自信,并将其活化为当代世界的文化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很多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中国人思想与精神的内核,而且对解决全人类问题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文学经典蕴含着丰富的命运共同体理念,迄今仍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天下为公”、“天下大同”展现了中国古人对理想世界的构思,“以和为贵”、“协和万邦”体现了中华文化对和谐关系的崇尚,“亲仁善邻”给出了处理国际关系的具体准则,“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突出了合作共赢的价值趋向,“天人合一”显现了对生态环境的尊重,如此等等。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文艺工作者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化经典,把中华美学与当代美学进行有机结合,激活中华文化内在的强大生命力,以具有中华审美风范的故事形态为人类提供精神指引、为世界贡献华彩篇章。最近几年,《唐宫夜宴》《只此青绿》等“国潮”与“国风”类文艺作品蔚然成风,在这方面

执火者的跋涉

——评《无以归类的现代精神——鲁迅文化论集》 □汤 晶

2022年6月,刘勇与李浴洋主编的《无以归类的现代精神——鲁迅文化论集》(以下简称《论集》)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北京师范大学鲁迅研究中心在鲁迅诞辰140周年之际便开始着手策划的学术论集,也是该中心自2021年正式成立以来首次推出的呈现学界鲁迅研究新成果与新动向的专题文集。《论集》以鲁迅的文学创作、生平拾遗、翻译实践、鲁迅研究之研究等多个方面为呈现对象,汇集了诸多资深鲁迅研究专家与青年学人的最新学术成果,反映了当代学界对五四传统和鲁迅精神的深刻理解,显示了鲁迅研究生生不息的态势。

《论集》以“无以归类的现代精神”命名,取自书中吴晓东的文章《直面无以归类的鲁迅》,致力揭示鲁迅其人及其文之于现代中国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和重要性。鲁迅不在某一个“群”,鲁迅是独异的这一个“个”。鲁迅面对的是千年变局下的转型中国,“现代”不仅是一个时间概念,更意味着一种新的文化选择。正如过常宝在序言中所说,鲁迅精神具有“文化人格的示范意义、强烈的民族责任感、无畏的担当精神、深刻的批判意识”。鲁迅是近现代中国社会转型路上的“执火者”,秉持着梦醒一人,荷戟独彷徨,“作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崇尚‘摩罗’精神的鲁迅与西西弗斯共分担那沉默的山岩。”“执火者的跋涉”体现在鲁迅留下的卷帙浩繁的作品中,体现在字字铿锵背后鲁迅的气节、风骨和人格精神上,也体现在一代又一代鲁迅学人的治学研究中。

《论集》分为“百年五四,百年树人”、“域外资源,文本经验”、“鲁迅研究的谱系与精神”以及“名著新读”四辑。

第一辑以“百年五四,百年树人”提纲挈领,立足百年的历史回顾,在中国社会、文化、思想的转折点、中国现代化的起始点注目“五四”的发生与鲁迅的出现,提出了对诸多重要命题的再思考。例如,张福贵论及“鲁迅与21世纪中国”,提出“百年中国思想文化历史由‘五四’而生,未来发展路向构想的分歧也由此而生,而鲁迅是理解这一进程最合适的历史标本与当下范例”。刘勇提出“鲁迅不是‘新青年’”,明确提出鲁迅是五四“新青年”浪潮中的特殊存在,他与“新青年”有着不同的美学追求和思想深度,是一个成熟的引路人,也是一个适时的融入者,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也是一个热诚的铺路人。此外,王锡荣以鲁迅与父亲的关系论“鲁迅的教育思想”;沈庆利从《我

作出了有益的探索,成为讲述中国故事的重要力量。

增强中国故事魅力

回顾文学史,不论是中文文学还是西方文学,对人类命运的书写都源远流长。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一部文学史即是一部人类命运的探索史。世界文学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美学实践,发挥着沟通人心的桥梁与纽带作用,对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世界文学大家庭的一员,中国文学应进一步深刻地参与到这个进程中去。历史上,中国故事在世界文学中的传播积累了良好基础。一部《马可·波罗游记》,记述了中国的繁荣昌盛,激起了西方世界对东方大国的强烈向往。一篇《赵氏孤儿》戏曲,展示了文明中国的形象,引发了欧洲“孤儿”改编的创作热潮。一本《狄仁杰断案全集》小说,描画出唐代名相狄仁杰的聪明才智,成为了欧美国家了解中国文化的畅销书。另一方面,西方杜撰的专事丑化中国人的故事,产生的负面影响亦不容小觑。正因此,我们更加注重发挥文学的正向作用。文学的力量如同春风化雨,潜移默化地形塑着人们的认知、思想与审美。现今,不论是接续中国故事西方传播的历史佳话,还是克服西方编造故事所酿成的形象歪曲、思想傲慢与审美偏见,都需要用心、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讲故事就是讲事实、讲形象、讲情感、讲道理,讲事实才能说服人,讲形象才能打动人,讲情感才能感染人,讲道理才能影响人。”只有经过形象化与情感化的文学承载与文学转换,只有经过文学性与审美性的调配与浸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中国梦的故事、中国人的故事、中华优秀文化的故事、中国和平发展的故事才能行之久远、深入人心。与分别作为经济学与社会学范畴的“中国经验”、“中国模式”相比,“中国故事”本身就可以看作一个文学范畴,它以文学的形式凝聚中国人丰富而独特的经验与情感,描绘出中华民族在一个新时代最深刻的记忆,并想象与创造一个新的世界与未来”。与新闻报道、文化宣传、哲学社会科学不同,文学艺术讲述中国故事自然以文学性、审美性见长。相比之下,文艺可以给外国民众提供了解中国的独特视角,使其在审美过程中感受魅力,加深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因此,文艺工作者要摒弃浮躁,不断修炼“内功”,提高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与本事,用精湛的艺术增强文艺作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坚持异化翻译策略

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对外翻译是其中一个重要环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为传播中国文学与文化,组织出版了《中国文学》、《熊猫丛书》与《大中华文库》等当代文学与传统经典的译介著作。其中的有些书籍在西方接受程度并不高,效果也不

够理想。一些学者将此归因于使用了异化(直译)的翻译策略,而未能采用归化(意译)的翻译方式,从而迁就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与阅读期待。这种观点常常举出的力证是,《红楼梦》的杨宪益、戴乃迭译本与霍克斯译本收获的反响相去甚远。霍译本的流行确实得益于它更为符合英语的诗学标准,得益于它更为迎合英美国家的普通读者。但作为文化输出的一方,“我们不能为了迎合西方‘读者’而刻意淡化甚至改变自己的意识形态。这是任何文化都不可能做的事”(张春柏教授语)。如果要主动或被动地投合西方读者,求得一时的流通,就难免会不同程度扭曲自己的文化,甚至以西方文化来剪裁、覆盖中国文化,这样的翻译作品就多少要打折扣,就不再是真正的中国文化。当《丰乳肥臀》中的“观音菩萨”被译为“圣母玛利亚”时,的确可以使西方读者理解起来更为顺畅,不过,“中国文学本该所具有的民族特性与审美取向在这种替代中消失殆尽”(乔国强教授语)。两位女神意味着截然不同的文化精神,难以相互等同。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异化与归化不可能“一有”而“一绝无”,而是同时并存、相辅相成。关键在于,作为翻译的指导原则,只有以异化翻译为主,才会尽可能忠实于原作,最大程度地保持文化的原貌与纯正,这关联着文化安全与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

异化翻译策略不仅是从“讲”故事到“讲好”故事的内在要求,还是文化全球化时代的必然选择。中国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大幅提升,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吸引力日益增强、传播范围日益广泛。当今世界,跨文化交往频繁而深入,正如中国读者不会再满足于林纾那种不时添油加醋的翻译一样,西方读者也不会再满足于霍克斯时代的所谓的“创造性翻译”,而是更期待阅读原汁原味的中国故事。同时,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外国读者逐渐具备阅读这种故事的文学背景与理解能力。以往需要归化翻译才能被读者青睐的故事内容,现在完全可以通过异化翻译而被他们接受。

讲好中国故事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创作、翻译、批评与传播等多个层面协力同心,形成合力。以上所论之外,讲好中国故事还需留意两点。其一,对于翻译出去的艺术作品,国际性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要及时跟上,争取扩大其在国际文艺界的知名度与影响力,从而使中国故事能够切实有效地走向世界,成为世界文学的一分子。其二,中国故事的域外传播既要重视在面上铺开且有一定的数量,又要有明确的针对性并提高传播质量;既要借助日新月异的技术,又要避免过度依赖技术;既要能“走出去”,又要能“走进来”。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它是一项长期的事业,需要扎扎实实、持之以恒、久久为功。

(作者系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民族音乐的传承和发展要做到与时俱进,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调整、不断完善,不能局限于传统文化范围之内,要吸收新的文化潮流,与时代并肩前行。将新的元素注入到民族音乐中,为民族音乐的持续健康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周俊

我们的民族音乐拥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融合了丰富的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和民族情感,凝聚着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智慧。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音乐在培养人民审美情操、提高民族整体文化素养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以潜移默化方式切实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民族认同感。分析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现状,聚焦其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于促进民族音乐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民族音乐包含了中华各民族音乐的精华和灵魂,系统展示了各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民族音乐有利于向全世界展示民族文化、民族风采,有利于团结各民族人民、凝聚民族力量,从而增强人民的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促进民族团结。除此之外,传承发展民族音乐还能够教化、熏陶民众,达到提高民族综合文化素质的效果。欣赏一个民族的音乐,就是走近一个民族的灵魂。通过音乐,可以更好地了解这个民族在漫长岁月中的文化积淀。

但随着时间的推进,民族音乐的发展也遇到一些问题。民族音乐是人们在口头上所创作出来的一种集体音乐形式,其中民歌则主要展示了某一特定区域人民的日常生活、自然环境和文化面貌,因此生活在不同区域的人所创造出来的民歌也各不相同。近些年来,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中国原始的乡村文化遭到了工业文化的破坏和外来文化的侵蚀,民歌在发展过程中日渐式微,甚至产生异化,失去了原始的韵味。此外,现阶段占据更多空间的是流行音乐和西方音乐,这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我国传统民族音乐的生存空间,特别是那些传统原生态音乐更加难以走进大众视野,而只是成为一种景观式的存在。这使得丰富多彩的民族音乐样式越来越像博物馆里的馆藏文物,只能在某些特定的时间和场合同有心人相遇。

从具体层面而言,20世纪初五线谱和简谱的流行使我们的传统古谱被淘汰,当前人们已经很难看到完整的古谱,能够识读古谱的人也在不断减少,甚至导致了传承断代的问题。其实,中国民族音乐也是有乐谱的,但是却缺少定量定级的音乐记谱技术,这导致中国民族音乐的传承受到阻碍。与此同时,民族音乐自身的灵活性也使民族音乐在传承过程中的难度相对较大。传统音乐对精确记谱的要求不高,更强调表演者在创作过程中的自由性和灵活性,这一方面使传统音乐灵活多变、精彩纷呈,但另一方面却影响了音准,使乐谱的记载容易发生偏差。比如,当前社会上广泛推广的十二平均律就因为民族音乐的多变性,而在传承过程中发生了音准缺失的问题。许多民族音乐作品利用十二平均律来演奏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偏差,使音乐的整体韵味发生了巨大的偏移,这不仅导致音乐演奏者在二次创作过程中出现了困难,也导致民族音乐原本的韵律难以展现,律制的不完整影响了民族音乐精髓的传承和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经验和优良传统的积淀,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根和魂。“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民族音乐凝聚着民族文化精华,展现了民族的风貌,是中华民族发展前进的重要动力。根植于传统文化土壤的民族音乐,只有随时随地在不断发展,才能在新时代绽放风采。新时代新征程是当代中国文艺的历史方位。步入新时代,增强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认同,要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创新思维观念,领会传统文化精髓。

要与时俱进,丰富民族音乐魅力。民族音乐的传承和发展要做到与时俱进,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调整、不断完善,不能仅局限于传统文化范围之内,要吸收新的文化潮流,与时代并肩前行。将新的元素注入到民族音乐中,为民族音乐的持续健康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比如,歌手朱哲琴在巡演中将内蒙古的民歌、苗族的飞歌、侗族的大歌融合在一起,以各地民族音乐为原声素材进行再创造,用丰富的想象力为听众呈现了多元化的中国民族音乐,展现民族文化的丰富内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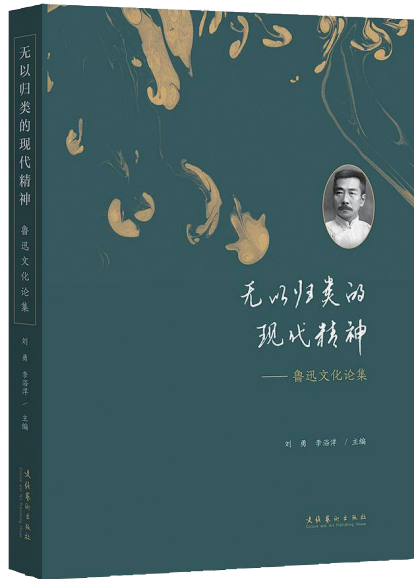
要包容并蓄,扩大民族音乐影响。全球化发展已成为时代潮流,中国民族音乐也应当走向世界,在全球范围内传播民族音乐的魅力,让全球音乐爱好者都能听到中国民族音乐的声音,向全世界展示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色和文化内涵,并在传播交流过程中进一步借鉴吸收其他民族优秀的音乐文化内容,从而为中国民族音乐的进一步创新和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比如作曲家谭盾依托于厚重的历史文化,用民族音乐传递着中国民族文化精神。作曲家何训田的作品《阿姐鼓》也以民族文化为基础,创新了音乐形式,与世界音乐进行交流,为民族音乐的创新发展之路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要同频共振,促进中西音乐交流。不同国家的音乐各具特点,所传达的情感和内涵也各不相同。与世界各国音乐进行交流,有利于进一步丰富我国民族音乐的内涵。民族音乐文化在与他者的交流中,不仅不会被外来音乐文化所同化,反而有可能在保留自身文化特点的基础上吸收外来音乐文化的精华,实现了进一步发展。因此,我们可以借鉴世界优秀音乐作品的精华,为自身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与动力。

综上所述,中国民族音乐的传承发展是一件复杂的事情,需要我们努力探索、持之以恒。因此,广大艺术家和音乐工作者应当不断更新自己的音乐观念,认识到时代发展的趋势,在积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族音乐精髓的基础上,与时代共同发展,站在世界舞台上,与世界各国优秀音乐文化交流,从而促进中国民族音乐的创新发展。

(作者系赣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讲师)

民族音乐当随时代发展



行的“新读”。鲁迅研究代有传人,正是在后来者对于先驱者足迹的辨认过程中,鲁迅研究的格局不断被拓展,延伸出若干新的可能性。该辑显示了鲁迅研究新辈的阅读姿态和精神追求,他们在研读多位鲁迅研究前辈学者的论著的基础上,探寻不同阶段鲁迅研究学者跌宕的文化与学术体验及其走进鲁迅的精神立场。“新读”鲁迅的青年学人都是北师大的学子,而鲁迅研究在北大可谓渊源有自。鲁迅是北师大最为著名的先贤之一,曾在日记中提到北师大三百余次,诸多鲁迅的至交、弟子与同道也曾经在此任教,共同奠定了北师大鲁迅研究深厚的学术积淀和学术传统。此后,一代又一代鲁迅研究者在北师大讲学、著述。既有李长之、李何林、王富仁等在鲁迅研究史上作出划时代贡献的学人,也有虽不以鲁迅研究名世,但仍有重要建树的钟敬文、郭预衡等学者,在北大百廿年历程中,热爱鲁迅、阅读鲁迅、尊崇鲁迅、研究鲁迅的杰出学者不断涌现。鲁迅文学与精神的原色经由前辈学人的深耕,持续不断地与当下鲁迅研究对话,开拓出新的研究空间。

钱理群曾说:“鲁迅提供另一种存在,另一种可能性,另一种观照方式。”这“另一种”便是鲁迅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谱系中的独异价值。100多年来,鲁迅始终是理解中国历史与未来、民族与世界的必不可少的方式和渠道。正如严家炎为北师大鲁迅研究中心中心题辞所说:“鲁迅是超前的,也是说不尽的,鲁迅不仅属于过去,更属于21世纪,属于未来!”由此,关于鲁迅的言说也将不断迎来新的起点,并生成出更多崭新的学术成果。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